

---

---

# 再论美洲由郑和船队发现的见解

林貽典

---

---

## 一、再论郑和船队曾经绕过非洲好望角的见解

本人曾提出根据《明史·外国传》记载木兰皮国曾被宣诏而未入贡，并且根据其记载之位置、物产、气候都与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吻合，认为与《毛罗地图》上两段注记关于中国帆船航行的记录可以互相对证，其记载都是真确的。

现本人再次提出新的分析、论点及证据，解释如下：

《毛罗地图》上有一注记说明约在公元1420年左右，有一艘来自印度的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之后，直接向西和西南方向驶入大西洋，但这个目的相信不是无缘无故的，应该是希望探索是否有新的国家或了解有关海流、风向等地理情况。但根据常理，首先应该是沿着非洲西海岸探索的，因为那里肯定是陆地，而且还是尚未探索过的。

所以《毛罗地图》另一注记提到中国帆船到达非洲西海岸的记载必然是早于公元1420年，期间刚好是郑和船队第五次航海的日期，因此更加可以证明《明史·外国传》与《毛罗地图》的可信性。

台湾有学者质疑《毛罗地图》的真实性，其论点为地图上所绘的帆船具有欧洲古帆船特色，因此认为不是中国帆船。但试想当时绘图者未曾见过中国帆船而将之绘成他们熟悉的欧洲古帆船，怎可能不会发生？事实上于郑和之后，中国帆船已经没有在印度洋大规模活动了，绘图者又怎可能见到中国帆船？所以绘图者由传闻中得知事实，将注记写成中国帆船，但绘画错成欧洲古帆船，并不表示《毛罗地图》的记载不可靠。

台湾和一些海外学者亦有根据《毛罗地图》上注解明确表示航行时不使用指南针，只使用牵星板，与郑和船队航行时罗盘与牵星板并用是互相矛盾。但有丰富经验的天文家有指南针可以不用，根据海流、风向、星星的位置辨别方向，并非没有可能，而且当时很可能在绿色群岛附近的海域已经可以用肉眼看见非洲海岸，或沿马达加斯加岛的海岸而航行，

或附近有很多珊瑚礁，需要站在船头看海面的情况领航。

该些学者亦指《毛罗地图》上葡文的 Concho de índia 的说法未必一定是指中国船，可以是指印度船。但《毛罗地图》所描述的船有四桅，其数目可增减，有 40 至 60 个供商人使用的船舱，它只有一个舵，很明显与《马可·波罗游记》关于中国船只的描述基本相同。

虽然根据《毛罗地图》，航程中的 Diab 是位于 Soffala 与桑吉巴之间，但并不表示就如该些学者所指，中国帆船到达好望角的说法要退到马达加斯加岛，因为 Diab 是航程中的一个停留站而非终点站，向西和西南连续航行 40 天才是终点站，需要 70 天后转回迪布角 (Diab) 是因为回航时是逆海流航行。现时马达加斯加岛最北端有一城市叫迪耶果——劳瓦雷斯，可能就是迪布角 (Diab)。另一注记甚至推测中国帆船至少越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到达非洲西海岸。所以《毛罗地图》上的记载应该是指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到达西南非洲的事实，应该不受《毛罗地图》上非洲南端的中国帆船是否错绘画成欧洲古帆船的影响。

香港有学者质疑《明史·外国传》的真实性，认为明清时代的学者对地理不熟悉，所以记载有很多错误，其中之一例子便是《明史》错误将佛朗机记载为近满刺加，即指葡萄牙是接近马来半岛，而不是在欧洲。但若细心分析，其后还有补充“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远，华人未尝至。”该补充是指佛朗机，红毛则是葡萄牙和荷兰，所以《明史》的记载也不致于错误。

因此《明史》的记载是可信的，只可惜没有记载曾被宣诏而未入贡的国家，以支持《明史·外国传》，现时只缺少第一手文献资料支持《明史·外国传》而已。

因为《明史·外国传》的作者尤侗于康熙十八年参与修《明史》时是 62 岁，虽然前半生有近 30 年是生活于明末，但离郑和年代已约 200 年，所以《明史·外国传》已经不是第一手文献资料。虽然较早的《皇明象胥录》亦有木兰皮国之记载，但没有表示木兰皮国曾受郑和船队宣诏，而且《皇明象胥录》的作者茅瑞徵，乃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生平年代至多比尤侗早 50 年而已，并不能视为第一手文献资料。

现时普通接受郑和船队到达最远的地方是根据《郑和航海图》画到东非之麻林地，但很可能《郑和航海图》只是画给普通民用目的，只是给惯常行走已经熟悉的航路而已。这可能是为了机密理由，不让船队可以洩漏情报给普通商人，得知那些地方可以采集钻石、黄金，所以没有随便发放有关部份航海图。

因为麻林地以北似乎没有比以南有更贵重的物产，例如钻石、黄金，根据文献记载，卜刺哇、竹步、木骨都束等曾受到访的东非国家，都没有贵重物产，但没有记载的东非之坦桑尼亚及之南的莫桑比克，以至南非及纳米比亚，甚至远至西非的尼日尼亚，都盛产钻石、黄金，而事实上坦桑尼亚以北的肯尼亚等东非国家就刚好不是盛产钻石、黄金。

又或认为麻林地以南之后的航路是非常之危险，例如海流急速，有暴风雨等的出现，为了安全理由，不随便发放该部份航海图。

于是现时学者只能根据不完整的《郑和航海图》得出郑和船队最远只能到达东非之麻林地的结论。

该结论应该是错误的，最明显的证据便是《明史》卷 326 所记载永乐中曾朝贡之千里达、失刺比、古里班卒，及一些有朝贡但风土、物产无可稽之国家，例如奇刺泥、八可意等，甚至郑和曾往赐之比刺、孙刺等国家，都不见于《郑和航海图》。所以应该还有一些国家是郑和船队曾到达而且比麻林地更远。

根据《明史·外国传》麻林、阿哇诸国的记载，有些朝贡国家只是仅存其名于会典，其中鲁密国可能就是《明史》卷 332 所记载之鲁迷国。该记载如下：

鲁迷，去中国绝远。嘉靖三年遣使贡狮子，西牛，给事中郑一鹏言：“鲁迷非尝贡之邦，狮子非可育之兽，请却之，以光圣德。”礼官席书等言：“鲁迷不列王会，其真伪不可知……”

……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并入贡。其贡物有珊瑚、琥珀、金刚钻、花瓷器、锁服、撒哈刺帐、羚羊角、西狗皮、捨列獬皮、铁角皮之属。

在东非地图，于莫桑比克与坦桑尼亚的边界，就有一条交界河名为鲁伍马河（Ruvuma River），其音近似鲁密，鲁迷，可能鲁密，鲁迷就在该处附近，而鲁迷的贡品中就有金刚钻，与该地盛产金刚石亦非常之吻合，该处刚好是在德尔加多角附近，即《毛罗地图》其一注记标明所在之索法拉角，而且又是绿色群岛的海域，正是《毛罗地图》注记所指由印度而来的中国帆船，横越印度洋之后到达的地方。

该处是在麻林地之南，因此郑和船队最远到达的地方应该不是止于麻林地了。

由鲁密、鲁迷、鲁伍马河（Ruvuma River）地理关系上的推论，亦可引证《明史外国传》记载的真实性，所以郑和船队是应该到访了木兰皮国，即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

一些学者认为木兰皮国是位于北非，其论点是根据 11 世纪后叶至 12 世纪中叶，Almoravide 王朝诸王统治 Al-Maghveb 与西班牙南部的 Al-Murabitun 王国，其音部份近似木兰皮，相信是受到《诸蕃志》及《岭外代答》关于木兰皮国位置辗转传闻记载很模糊的影响。

南宋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在卷 2〈海外诸蕃国〉中有如下关于木兰皮国位置很模糊的记载：

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

西大食海是指地中海，所以该记载只是指在地中海之西，即大西洋的西非沿岸，有千余个国家，但西非沿岸是很长的海岸，一直伸展至南非。木兰皮国只是该千余个国家之其中一国。更西便是大西洋另外一边的美洲，是黄昏太阳日落之处，所以便是“更西则日之所入”，因为当时尚未知有新大陆，所以便是“不得而闻也”。

但若再加探索，《岭外代答》另外在卷 6“木兰舟”中有如下的记载：

又大食国更越西海至木兰皮国，则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

该记载指出在不遇便风下航行，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到达木兰皮国，很明显是指沿着西非海岸航行所遇到的逆风和反方向而来的海流，若木兰皮国是在北非，在地中海航行及出

了地中海之后根本不会航行很远, 怎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若是受季候风影响, 不可能数年在地中海航行都不遇便风, 这些情况应该是指经常性的自然地理现象, 沿着西非海岸向南航行不远, 过了佛得角群岛, 转入几内亚湾后, 刚好就遇到逆风和反方向而来的海流。

葡萄牙人就是因为海流关系, 数十年间在西非的探索进展很是缓慢, 最后狄亚士于1488年及达迦玛于1498年, 改变航线方向, 驶离非洲海岸, 避开不利的逆风和海流, 才能到达南非的好望角。

因此木兰皮国是在西南非的纳米比亚, 所以《岭外代答》在卷3“木兰皮国”的记载中有“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 所指的是沿着非洲东海岸航行了, 因为在非洲东海岸向南的方向航行是顺风和顺海流。非洲东海岸是在航线的正西方, 一百日而至之的航海距离亦很合理, 所以木兰皮国必然是在西南非的纳米比亚。

因此《岭外代答》关于木兰舟及木兰皮国的记载正反映出从东非海岸及从西非海岸航行至木兰皮国的时间及所遇到海流及风向的情况, 所以整个非洲的海岸线早已被阿拉伯人探索过了。

木兰皮之名称亦是有迹可寻, 因为公元1488年葡萄牙人狄亚士初次绕过好望角的航线是先从纳米比亚驶离海岸, 在大西洋航程中找寻合适的风向, 然后从好望角以南比较远的大海才折返回南非, 着陆地点是在好望角以东300英里, 向前稍作探索之后, 才回航发现好望角。该首次着陆南非地点附近, 就叫做“Mossel baai”, 与现时莫桑比克, 即Mozambique的发音很接近, 而莫桑比克曾经就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 可想而知其名称的演变是由葡萄牙文而来, 但葡萄牙人肯定是借用了非洲某些地方的名称而定名Mozambigae与Mossel baai, 很可能就是与木兰皮之名称有关, 因为它们的发音都很接近。

不但如此, Philip's ATLAS OF WORLD HISTORY 关于大约公元5世纪前南部非洲的历史地理图, The Spread of Bantu Speakers 就似乎指出木兰皮国是在纳米比亚, 因为该图所指早期形成的部落聚居地, 现时地名是Mirabib, 其音远比一些人认为木兰皮国是在北非所根据之Al-Murabitun更加近似木兰皮, 几乎就是木兰皮的发音。而且Mirabib亦似乎如木兰皮国记载所指“陆行二百程”距离的内陆。相信Mirabib的名称来自木兰皮, 所以木兰皮之名称早在《岭外代答》成书之前至少存在了数百年。

同时该历史地理图中的Sheep-farming site, 即饲养羊群的地点, 几乎全都在西南非洲, 只有一处位于东南非洲的内陆, 与《诸蕃志》和《岭外代答》中之木兰皮国有巨羊或胡羊的记载很吻合。因此中国人于南宋时已经知道非洲南部的情况, 甚至公元1389年的《大明混一图》已经画出非洲南部, 所以之后郑和船队亦应该知道非洲南部的情况而到访该地。

明慎懋赏辑之《四夷广记》在西南夷一章列出昆仑山, 木兰皮国等50多个国家名称之后, 提及永乐、宣德间中官使西洋有随去周老人所说诸国, 例如产波罗、甜瓜的特播里国, 产西瓜的曼陀郎国, 产仙鹤的麻那里国, 产尾重余三十斤羚羊的马哈国, 可能就是位于非洲西南部或更远的地方, 因为几内亚有热带森林, 亦盛产菠萝, 而东南亚等热带地方似乎并不盛产菠萝, 要远至太平洋的热带岛屿, 例如斐济等, 才有盛产菠萝的地方, 但那些地

方并不属于西南夷范围。而羚羊在非洲是很普遍，尤其是指尾重三十斤的羚羊，似乎就是指西南非才有的直角大羚羊。其它诸国还有产茄树的须文达国，产甘蔗的苏吉丹国等，都可能位于西非。

虽然周老人所说并没有明确指出那些国家在那里，但该记载是辗转传闻的第一手资料，因为可能是慎懋赏年轻时，即数十年前听周老人所说，而周老人在当时所说的数十年前，即周老人年轻时随郑和船队前往了那些国家。

这些资料亦可支持郑和船队曾经绕过非洲好望角的论点。

## 二、再论郑和船队发现新大陆及环绕地球一周的见解

本人曾提出根据清初人《钞本残卷》记载郑和船队经乌龟洋遇到暴风浪而没有遇到热带台风之暴风雨的地理特征，认为郑和船队曾到达南美洲厄瓜多尔西方约 970 公里太平洋上的加拉巴哥群岛附近。

本人亦根据《明史》记载巴喇西国位于离中国很远的东南海，贡品有祖母绿，因此认为巴喇西哥乃哥伦比亚，所以中国人于公元 1501 年前可能已经到过中南美洲、墨西哥太平洋沿海城市，阿卡普尔科的拉克布拉达广场于 1936 年 11 月 20 日纪念 1400 年前中国帆船到达该港所建的纪念碑可能亦是证据。

本人现再次提出新的支持论点，根据为《历代小史》卷 79，祝允明（1460—1526）所撰之《野记》。

《野记》亦有巴喇西国的记载，《野记》成书的日期相信是在公元 1511 年，因为在记载巴喇西国使者前来入贡的经历中有“至今年五月才附番人奈林船入广东”之句，而今年是指正德辛未岁入贡日期，即公元 1511 年。

由于《明史》记载之巴喇西国亦出现于《野记》，为东夷诸国传闻记载之一，虽然祝允明对此表示不知道是否可信，但祝允明刚好就是生活于当时年代，所以《明史》的记载得到了第一手资料的支持。

《二十五史三编》第九册考证巴喇西的音译为波喇斯，认为是波斯，因使者由海路而来，明朝时代的人对地理不熟悉，便误认为由东南海而来。

本人不同意此说法，因为明朝时代的人怎样对地理不熟悉，也不可能糊涂到凡是从海路而来的使者都误认为由东南海而来，大食国的使者也有很多都是从海路而来，为什么明朝时代的人不误认大食国是位于东南海？而且波斯根本就在大食附近，明朝时代的人怎可能会弄错？

《野记》第 54 页有如下关于东夷诸国传闻的记载：

旧传东夷诸国多乞赐，书及赐竟不能达，凡数四，每有之舟辄溺，或曰令人诵记去，人亦不达，未察信否。

在巴喇西国记载之后，有如下关于东夷诸国物产和动物传闻的记载：

辰州杨君说：上供硃砂，舟中以竹筒贮，砂筒外以狗皮裹衣，又频涂狗血，以其精英焰发，经行江湖，龙欲戏取之也，杨又说砂产处奇秘，与采取之法甚巧。

岭南友人说：大蟒蛇食人、鹿、牛、皆通体，吞之不咀嚼，既下咽塞于膈臆，即下水浸两三日，则肉糜于腹肠矣，或遇大角双格，吻傍不能入，则鹿死而蛇困。如遇蛇啮，急拔去已顶心上发，掐破顶皮，毒水出即愈。

旧传应该是指很多年前，东夷诸国很多都向中国乞求赏赐，中国传递的国书及赏赐竟有不能到达数次之多，派出的船每四艘船便总是有一艘在航程中沉没。又或这只是一种说法，有人令其他人将此说法传诵开去，但传诵此说法的人亦没有到达东夷诸国，因此未能觉察此传闻是否可信。

由于传闻已是旧传及在祝允明年代传诵此说法的人没有到达东夷诸国，因此旧传发生的年代必然是在祝允明年代之前，即祝允明之上一代年代的数十年之前，这刚好是在郑和航海年代期间。

所以《野记》中所记载东夷诸国关于祝允明年代所发生的事件便只有巴喇西国使者于正德辛未岁，即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之前前来中国入贡所遇到的10年多旅程经历。

该经历中巴喇西国使者的船在西兰海坏了，于是乘坐一小艇到达得吉零国，可能就是位于接近马来半岛东南面海底发现中国古代沉船的地方，根据当地窑窟之一地名(hame for their kiln sites)，沉船主题被命名为Turiang，发音就近似得吉零，所以很可能附近的小岛就是得吉零国，由该小岛渡海，很直接便进入马来半岛，与《野记》所指到达地名秘得，再经陆路到达暹罗，路线上似乎极有可能，所以进一步理解Turiang当地的历史，或由泰国历史中找寻是否有巴喇西国使者前来的记载，可能可以引证《明史》或《野记》的记载是否可信。

传闻记载之辰州杨君说提及“上供硃砂”的“上”是指高地，“供”是供应，硃砂是一种矿产。所以“上供硃砂”指的是东夷某处山岭高地上生产一种硃砂矿产。

杨君说提及之“龙欲戏取之也”的龙，相信是鳄鱼，因为鳄鱼除了没有角，外形与中国传说中的龙极为相似，只是身体较为粗壮及短小而已。

所以杨君说的记载便是指在高地上供应硃砂，舟中以竹筒贮藏的硃砂，用狗皮裹之及涂了狗血，混合下发放了硃砂特殊的气味，在江河湖泊中航行，鳄鱼亦被吸引而来夺取。生产硃砂的地方是非常神秘，采取之法是非常巧妙。

另一传闻记载之岭南友人说指在东夷某处有大蟒蛇，即大蟒蛇，可以将人、鹿、牛等动物整个吞下，亦有描述有大蟒蛇在吞鹿时被鹿头上的大角格住，无法将鹿吞下，鹿即死去，但大蟒蛇亦无法放下鹿而离去受困。

岭南友人说亦指遇到被蛇咬时，快些拔去头上的发钗，刺破被蛇咬的皮肤部位，毒水流出之后便会痊愈，似乎指出曾到达东夷地方的是中国人，因当时中国人传统上是将头发蓄起，头顶之上加以发钗。

这些传闻记载所指的硃砂、鳄鱼、大蟒蛇、鹿、牛及巴喇西国有祖母绿的情况，只有在南美洲北部才会全部找到。法属圭亚那就盛产硃砂，亚马逊河流域近委内瑞拉的地方就

有世界上最大的大蟒蛇，鳄鱼和鹿等动物亦经常出现。

虽然菲律宾及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亦有大蟒蛇，大小亦可以接近南美洲的大蟒蛇，但那些地方并不可能是传诵传闻的人全都没有去过，亦不可能不可以觉察是否在哪些地方，因为东南亚早就已经与中国有交往，甚至已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定居，《野记》应该是可以分辨出传闻所指的不是东南亚。

而且鹿在东南亚的分布亦只限于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中南半岛等地，较远的新几内亚，澳洲都没有鹿的踪迹，明朝时代的人更加应该不会弄错。

若认为传闻是由欧洲方面传诵而来，亦似乎不大可能，虽然西班牙人于公元 1499 年已开始在南美洲北部海岸探索，但尚未进入内陆，所以当时未必知道有如《野记》中传闻所述的记载，根据现时文献资料，欧洲人对南美洲北部内陆的探险于公元 1512 年后才开始，但已在《野记》成书之后，所以全部事情由辗转传闻至中国而记载于《野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反而于郑和航海年代由中国传诵至欧洲的机会就比较大大得多。

《野记》第 12 页另有关于地球纬度及纬度间距离的记载，该记载如下：

国初，司天之官犹候气测、景测，用八尺之表，而郭守敬用四十尺，故号精密，今并废。

南极入地三十六度，北极出地三十六度，皆以地尽处言，今南京乃入十二度，至苏殆十五度，北京出十五度。

该记载指出在明朝初年，尚进行天象气候及地理景象之测量，测量的仪器用 8 尺长的表，而元朝的郭守敬则用 40 尺长，所以被称为精密，但至祝允明年代，这些测量已经停止，其仪器也已被废弃。

记载所指的“地”或“地尽处”，应该是指赤道，“入”是指向下，即向南的方向，“出”是指向上，即向北的方向，所以“南极入地三十六度”，是指南极是在赤道南距三十六度的地方，“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指北极是在赤道北距 36 度的地方。

“皆以地尽处言，今南京乃入十二度”是指赤道是位于南京南距 12 度，“苏”可能是指首先见到的陆地，陆地初现便是苏醒之处，所以“至苏殆十五度”便是指在南京向最远的南方所首先见到的陆地差不多是在南京南距 15 度的地方。

“北京出十五度”是指北京在赤道北距 15 度的地方。

现时地图标准，北极是在北纬 90 度，南极是在南纬 90 度，赤道是在 0 度，所以记载中之“南极入地三十六度”的“三十六”度即现时地图纬度的 90 度，即记载中之每一度，是代表现时地图的 2.5 度纬度。

于是记载中南京与赤道的距离，便是“今南京乃入十二度”所指的 12 度乘以 2.5，即是 30 度纬度，与现时地图南京与赤道距离的 32 度多一点，亦只是相差 2 度多一点，误差只是因为 36 度中没有再细分，若一地之误差会有 0.5 度，两地之间的误差便刚好有一度，即现时地图上的 2.5 度纬度了。所以以当时标准而言，2 度多一点尚在 2.5 度之内，测量结果还是很准确的。

“至苏殆十五度”所指在南京南距 15 度，即在南京南距 12 度的赤道再南距 3 度的地方，

所指3度乘以2.5,即在南纬7.5度,这刚好是爪哇岛,爪哇岛之南是印度洋,因为明朝初年尚未知道有澳洲,所以便认为哇岛是南京向最远的南方所首先见到的陆地。

“北京出十五度”所指15度乘以2.5,即37.5度,与现时北京所在的北纬40度小一点,误差亦在2.5度之内。

南京与北京的纬度测量都比现时地图标准小了2度多一点,这可能表示当时的赤道被认为是在现时北纬2度多一点的地方,亦可能这只是测量的误差。南京、北京、爪哇都差不多在同一经线,可能当时已经知道以经线为基准,测量两地间纬度的距离。

无论如何,该段记载已充分表示在明朝初年,中国人已经知道有南北极,赤道的概念,以纬度表示在同一经线两地南北之距离,所以应该知道地球是圆的,及地球的半径是多少,并不是明末意大利人利马窦来华时才传入地圆之说。根据文献记载,地圆之说于元朝由阿拉伯人传入。元朝时郭守敬就曾制造很多天文仪器,可能与知道地圆之说有关。郭守敬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四大天文学家之一。

《元史》卷48,〈志第一〉就有记载各类由郭守敬制造之天文仪器,并分章节,例如〈简仪〉、〈仰仪〉、〈圭表〉等。

〈志第一〉亦于《大明殿灯漏》记载测量时间的仪器,可能与测量地球经线的度数有关。

于《西域仪像》记载中有“刻天度一百八十,以准地上之半天”,似乎指出站在地上所见之天空只是天空之半,另一半天空是穿过站在地下之另一面。在半天刻天度180,与现时圆周的一半是180度的观念完全一致,很明显是应用地圆之说。

于《天文一》记载中指出自郭守敬开始,80年间都有在各地测景,称之为四海测景。

于《四海测验》记载中更列出有27个测景之所的北极出地度数,都以北极作为参考,测量在各地之刻天度,例如大都是在北极出地40度太强,大都即现时北京,测量结果与现时北京所在之大约北纬40度小一点很是接近,稍微偏差很可能只是测量的地点有些偏差而已。

最南的测景所在南海,位于北极出地15度,最北的测景所在北海,位于北极出地65度。

南海测景所是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

北海是指北极的北冰洋,测景所的地点很可能是由额尔齐斯河流入的鄂毕河,再流入至北冰洋的河口附近,即是位于北极圈的北纬66度33分附近,但能见到海洋的地点是在北纬66度以上,与测量结果之北极出地65度相差小了一度,似乎表示北海测景所未必位于该处,整个西伯利亚就只有东端近白令海峡或白令海的地方,才有北纬65度的海岸,可以见到海洋。所以很可能北海测景所就在该处附近。虽然在展开了的地图上,两者看似相距很远,但在北极圈纬度附近,彼此之间并不是如想像中相距那么远。

但无论北海测景所的地点在哪里,都表示元朝时中国人已经试图找出世界之尽头,所以很可能已经推想向北越过北海会到达地球的另一半,或向东渡过北海也会到达另一半的新世界。因为刻天度之180只是测量了最南之15度至最北之65度,尚有大半其它地点未有作出测量。

明朝初年继承元朝在天文地理学的成果,应用于航海方面是顺理成章的,所以郑和船



队是应该知道地球是圆的，若果郑和船队曾经绕过好望角，甚至如英国学者孟席斯根据公元1428年世界地图中之笔记所指，于公元1420年间到达了非洲极西端的佛得角群岛，那么由佛得角群岛向西前进至中国，和向东返回中国，以经线距离计算，向西与向东至中国的距离比例为大约1.4倍。

由于地球自转的关系，向西航行基本上是处于顺风 and 顺海流，而向东则相反，基本上是处于逆风和逆海流，所以郑和船队应该知道由佛得角群岛向西航行未必会用上较长时间返回中国。

环绕地球一周的麦哲伦于公元1519年9月20日由西班牙启航，向西绕经南美洲，至公元1521年4月7日到达菲律宾，用了大约1年零6个多月。之后他的随从由菲律宾经印度洋，绕过非洲，回到西班牙时是公元1522年9月6日，期间再用了1年零5个月，两者所用的时间，几乎是相等。由西班牙向西航至东方的菲律宾只是比由菲律宾返回西班牙多了1个多月而已，但这只是指基本上是处于同一顺风和顺海流的方向航行。

西班牙所处的经线离佛得角群岛不远，而菲律宾所处的经线亦离中国沿海不远。若果郑和船队已经认为地球是圆的及知道地球的直径是多少，他们亦如西班牙人的想法一样，若是送回了西非一些国家的使者，例如比木兰皮国更远的西非国家使者，之后亦可能会航行探索至佛得角群岛，同样会继续向西航行，经此航线返回中国。

孟席斯根据公元1428年世界地图中的笔记所指之公元1420年间绕过好望角到达佛得角群岛的郑和船只，很可能只是探测先锋船，那些先锋船回航时未必返回中国，很可能只是停留在印度或马来半岛等中途站，等候第六次航海的郑和船队，于公元1421年间会合后，作为领航，而不必于公元1421年前返回中国庆祝迁都大典。所以时间上便可容许那些先锋船可以探测得更远，可以到达佛得群岛。

若果事实如此，郑和船队的计划是很周详的，在第六次航海启航前，已经对大西洋一些地方的海流作出了详细探测，如《毛罗地图》所指，曾有船于好望角以南的西南方连续航行了很多天，及亦有船探测了绕过好望角一带的西非地方，甚至如孟席斯根据公元1428年世界地图中之笔记所指，已经有船到达了佛得角群岛。

所以并非如一些人猜测，郑和船队某些船是无意间被风吹到加勒比海，而是整个航程是有计划及目的，相信是希望发现新大陆及新的未贡国家，宣扬中国国威。

### 三、郑和船队发现澳洲的见解

根据刘渭平所著《大洋洲华人史事业丛稿》一书，郑和船队发现澳洲之说相信最早是源于1879年在达尔文市郊筑路时，在海拔70尺处一棵大榕树发现一玉石寿星像，其后在1928年3月8日的南澳省皇家学会年会上，有论文说明该玉石寿星像是中国产物。于1954年8月在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汉学家会议上，英国汉学家费支列氏(C. P. Fitzgerald)撰写的《中国人发现澳洲吗?》一文认为该玉石寿星像可能是郑和部下的水手在澳洲北部登陆

时偶然遗下的。

支持的论点认为该棵榕树的树龄已在150年以上。因此该玉石寿星像已埋在榕树下超过150年。但亦有人认为该玉石寿星像被发现之前4年,已有大批华工在该地开辟道路等工作,于期间遗下的。

郑和船队经常都到爪哇,而爪哇离澳洲不远,所以有论点认为可能有部份船只于航行途中被风吹到澳洲北部。

《明实录》之〈太宗永乐实录〉卷之1010就有如下的记载:

永乐十六年(1418)戊戌

丙辰(初七)爪哇国王杨性西沙遣使惟叔等奉表献白鸚鵡及方物。先是,卫卒王周镇等随诏使往西海,风漂其舟至班卒儿国,为番人所羈,爪哇村主珍班闻之,以金赎周镇等,还之王所,王付惟叔来归……

其中之班卒儿国,可能就是澳洲北部的达尔文市。《郑和航海图》在苏门答腊岛上有一名为班卒的地方,但应该不是班卒儿国,因为班卒在苏门答腊西部,船只若要被风吹到那里,必须通过爪哇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海峡,或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的海峡,绕过苏门答腊岛西面,才会有机会发生,但班卒是在赤道无风带,而澳洲北部是处于热带台风区,达尔文港在历史上就曾多次受台风吹袭,做成很大破坏。所以郑和船只航行经爪哇是不可能被风吹到苏门答腊岛上的班卒,而应该是被吹到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港。

澳洲的地形很象“兒”字的上半部,西海岸和东海岸就像“兒”字的左右两斜画,北方距离比南方距离稍为宽阔,即使澳洲南部向内弯的部份亦很像“兒”字下半部般中间凹下,塔斯玛尼亚岛便很像“兒”字下半部右边的尾部。而达尔文市刚好在“兒”字上半部开口向左斜画之顶端位置。所以这可能表示澳洲的地形早已被绘画出来了。

又或“兒”字表示未成年,即表示尚未建设成港口的港湾,《郑和航海图》就有地名以“兒”字作为其最后的名称,例如莽葛奴儿,起儿末儿等,全都在海岸湾口附近,或附近有岛屿,可形成天然的船只停泊地方,而达尔文市亦刚好有港湾和附近有岛屿,这些都可能与班卒儿国的命名有关,所以班卒儿国很有可能就是澳洲北部之达尔文市。

《明实录》记载风飘至班卒儿国的年份为永乐16年,即公元1418年,这刚好是郑和船队第5次下西洋期间,相信卫卒王周镇等随诏往西海是为了探索整个印度洋,或甚至大西洋的情况,所以发现澳洲不足为奇。

这亦可支持《毛罗地图》所指曾有中国帆船于大约1420年探索大西洋,可能卫卒王周镇随诏往西海的其它船队,未有被风飘至班卒儿国,继续往西海探索,或卫卒王周镇等被接回爪哇后,稍后亦往西海探索。

以班卒为地名之一部份而命名的国家尚有古里班卒。

《明史》卷326有如下古里班卒的记载:

古里班卒,永乐中,尝入贡,其土瘠谷少,物产亦薄。气候不齐,夏多雨,雨即寒。

明嘉靖年间郑晓所著的《皇明四夷考》亦有如下古里班卒的记载: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乐三年，国王遣人马的，来朝贡，其俗，土瘠，谷少登，气候不齐，夏多雨，雨即寒。俗质朴，男女被短发，假锦缠头，红油布系身，物产甚薄。

古里班卒若不是苏门答腊岛上之班卒，便应该是澳洲南部。因为澳洲南部和西南沿海属地中海式冬季降水区，冬季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百分之四十至六十。而南半球的冬季即北半球的夏季。而且澳洲南部亦会受南极吹来的“南寒风”影响，气温亦会寒冷。这种地理特征只有澳洲南部才有。《古今图书集成》甚至提及《明一统志》记载古里班卒的气候为“夏即多雨，多寒风”。

若根据地名位置的推测，班卒在苏门答腊西部，古里在印度西南部，即古里班卒便应在澳洲之西南部，所以应该在佩思附近。若以太平洋为中心所画包括亚洲、美洲、澳洲的地图，苏门答腊西部海岸与澳洲西部海岸会在同一直线上。以其它地点为中心的地图，苏门答腊西部海岸与澳洲西部海岸亦会在同一弧线上，所以古里班卒的命名可能就是与此地理位置有关。

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古里班卒就是在澳洲西南部，因为《明史》及《皇明四夷考》始终没有古里班卒位置上的记载。

而且《岛夷志略》关于班卒与《明史》或《皇明四夷考》关于古里班卒都有相似的气候记载。

《岛夷志略》就有如下关于班卒的记载：

地势连龙牙门后山，若缠若断，起凹峰而盘结，故民环居焉。田瘠，谷少登，气候不齐，夏则多雨而微寒。俗质。披短发，假锦缠头，红油布系身。

煮海为盐，酿米为酒，名“明家西”。有首长。地产上等鹤顶、中等降真、木绵花。贸易之货，用丝布、铁条、土印布、赤金、瓷器、铁鼎之属。

龙牙门位于苏门答腊，所以班卒是位于苏门答腊，亦与《郑和航海图》所指一致。

虽然所指班卒之微寒未必是古里班卒之即寒，而且苏门答腊岛的气候亦非有寒冷的季节，修《明史》或《皇明四夷考》的人没有可能不知道《岛夷志略》中有班卒之记载，不可能明知是班卒亦会将之写错成古里班卒，微寒写错成即寒。

又或认为郑和船队取其近似班卒土瘠及夏季多雨之气候，近似古里在印度的位置，将发现澳洲西南部近山脉处，或西南部一些岛屿，可能亦如班卒般‘起凹峰而盘结，故民环居焉’，故命名为古里班卒。又或其民族，如同马达加斯加岛，都是源于苏门答腊岛，与班卒有关。

甚至认为明初已知测景之地以南京为中心，由元朝所设最南之南海测景所，即位于南中国海的地点，再向南找到可能如《野记》所记载由南京‘至苏殆十五度’的爪哇作为测景所之后，在同一经线一直向南找寻测景之地，必定会找到澳洲。因为《元史》是明初修的，应该已经知道卷48《志第一》之〈西域仪像〉记载中有“刻天度一百八十，以准地上之半天”的天文地理观念，而认为另外之半天可能会有新世界，而爪哇就是在南半球之另外半天，所以再向南找寻该半天的情况，不足为奇。郑一钧撰写的《领（下转第106页）

- [9] 《神户福建同乡家族名簿》，社团法人福建同乡会，第 5 页，1998 年。
- [10] 《续·长崎华侨史稿资料编》年报第四辑，长崎华侨研究会，第 70-83 页，1988 年。
- [11] 《续·长崎华侨史稿资料编》年报第四辑，长崎华侨研究会，第 66 页，1988 年。
- [12] 《神户福建同乡家族名簿》，第 6 页，社团法人福建同乡会，林圣福先生提供，1998 年。
- [13] 《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 352-358 页。
- [14] 市川信堂：《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资料》第一辑，长崎华侨研究会，第 65 页，1985 年。
- [15] 《阪神在留华商及其贸易状况》，第 213-215 页、第 144-147 页，贸易局（日本），1938 年。
- [16] 鸿山峻雄：《神户大阪的华侨》第 35、46、48、56 页，华侨问题研究所，1979 年。

作者许金顶：华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泉州：362000）

（上接第 17 页）

先于哥伦布、麦哲伦的航海巨人——郑和——一文就指出《宁波海州平阳石矿流水表》有记载于永乐元年，即郑和下西洋之前，郑和船队已首先对东西二洋进行了海洋调查研究。

但始终《岛夷志略》有这样相似的记载仍然可以令人认为古里班卒可能是班卒，而且《皇明四夷考》记载古里班卒前来朝贡之年份是永乐三年，表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发现澳洲，非常令人质疑。《明史》也可能怀疑《皇明四夷考》，所以采取较为简单的记载，没有指出古里班卒于永乐那一年来朝贡，及没有风俗的记载。

所以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才可以确定古里班卒是否位于澳洲西南部，例如地形是否与班卒相似，物产是否缺少了班卒地产之鹤顶、中等降真、木棉花等的考证，或其它方面的证据。

虽然如此，与《郑和研究与活动简讯》第九期第 14 页提及之三项证据：

1) 英国博物馆保留之英国传道士日记，提及该传道士曾看到郑和送给明成祖的瓷盘所绘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有澳洲地图，但此瓷盘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后就失踪了。

2) 北澳达尔文市附近原住民保护区内供奉可能是中国人留下的神像。

3) 南澳海边发现可能是郑和时代的宝船。

都刚好是可以互相对证，似乎并不是可以用巧合理由解释，因为有关记载都指出事件是发生在永乐年间，似乎在文献上是可以找到支持，亦即是支持的论点是可以再进一步了。

作者林貽典：香港学者